

## 「儒家社會主義」的歷史語境與局限

◎ 王 俊

在〈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讀書》2007年第6期，以下簡稱甘文）一文中，甘陽先生提出了「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說法。甘先生認為，當前中國正在形成「新改革共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正是這種「新改革共識」的體現。甘先生指出，之所說當前的改革共識是「新改革共識」，原因在於，它不只是改革開放後三十年所形成的通行改革共識，而是以平等為價值核心的毛傳統和以效率為價值核心的鄧傳統，以及以和諧為核心的中國儒家傳統為共同價值基準的新共識，這種新共識的發展可能導致一條「中國道路」——「儒家社會主義」，按照甘先生自己的說法就是，「從長遠的意義看，當代中國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如果得到健康的發展，將有可能逐漸突顯『中國道路』的真正性格，這就是：中國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形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僅如此，甘先生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中華」提出了新解釋，認為「『中華』的意思就是中華文明，其主幹是儒家為主包容道家佛家和其他文化因素」。顯然，甘先生的這種新思考和新提法很有新意，是從理論上概述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實踐的有益嘗試。但是，甘先生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提法是否能概述當前的中國社會發展實踐及未來發展方向，這還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本人不揣淺陋，想在此提出幾點質疑，並分析這一提法的歷史語境及其局限。

### 一 「儒家社會主義」的合法性問題

所謂的合法性問題就是能否對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嚴格的論證問題。我們看到，在甘先生的文章中，合法性問題顯然是被忽視了的問題，甘先生只是提出了「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概念，但對這個如此重要的概念卻少有論證。縱觀全文，其重點在於論證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歷史連續性，涉及到「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內容不足全文的十分之一，總字數不足一千，真可謂點到為止。對於甘先生如此地惜墨如金，我們除了感到遺憾之外，也感到不能理解：甘先生是不願論證還是不能論證呢？從不願論證來說，它包含兩種可能，一種是它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無需作者再去論證；另一種是對它的論證存在著很多忌諱，作者不願自己的論證給自己帶來麻煩。從當前的現實看，前一種情況肯定是不存在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肯定不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如果是的話，甘先生提出來也就沒甚麼新意可言了。至於後一種可能，我們不能排除，甘先生是不是有所忌諱，或者忌諱甚麼東西，我們不好在此妄加揣測，姑且存疑好了。不過，除了不願論證之外，不能論證也不是可以完全排除的，這個命題事關中國古代傳統、西方市場傳統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其大與廣是不言而喻的，作為一種假想提出來是容易的，如要深入論證則是非常困難的。故此，從該命題的難度上看，甘先生不能論證也是理所當然的。

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即甘先生不是提出了一個需要論證的問題，而是提出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儘管在其行文中，甘先生言之鑿鑿，似乎「儒家社會主義」乃是中國道路的正途，但我相信他肯定無法論證這個問題，所以，還是讓我們後退一步，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加以討論吧。但是，僅使作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提出，其合法性也不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合法性問題總是值得討論的核心。所不同的是，在論證中，合法性問題是個封閉的問題，是作為一種正確或確定的結論所做的符合邏輯的證明；而在討論中，合法性問題是個開放的問題，根據其合法性限度，命題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也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

不管怎樣，還是讓我們看看甘先生的命題需要面對哪些合法性問題吧。我們先來分析「儒家社會主義」的語法結構。我們看到，這是一個偏正結構，「儒家」是修飾詞，「社會主義」是主詞，修飾詞代表性質，主詞代表實體，因此，從「儒家社會主義」的語法結構來看，它表達的意思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或者說，中國社會主義的方向，是用儒家思想來指導社會主義，形成一種儒家性質的社會主義。如果是這樣的話，儒家是否要取代馬克思主義？那麼，儒家和馬克思主義將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如果甘先生要論證「儒家社會主義」的話，這是他首先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當然，甘陽先生肯定不會說「儒家社會主義」就是要用儒家思想來指導社會主義，而如他自己所說的，它指三種傳統的融合。但是，這三種傳統如何能融合到一起？即使融合到了一起，又為何要稱為「儒家社會主義」？儒家傳統和其他兩種傳統是甚麼關係？「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是否意味著儒家傳統在三種傳統中最重要又佔主導地位？這些問題都是甘先生所無法回避的。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從歷史上看，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前夕。伴隨著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對蘇俄革命的介紹，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認識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同「五四」時期的各種新思潮一樣，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對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傳統是持批判態度的，而當時的中國儒學界也大多抵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把它們看作為激進主義或貶低為共產共妻的原始共產主義，從總體上來看，社會主義與儒家思想基本處於衝突和對立之中。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儒家和社會主義更是水火不容，全國一片批孔之聲，儒家思想成了封建餘毒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之後，儒家思想開始作為歷史傳統被重新認識，但其主流思想也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批判地繼承。其實，當今中國早就不存在所謂儒家了，或者說，儒家思想早就支離破碎了，甘先生提「儒家社會主義」顯然是不符合中國當前思想現實的，儒家是歷史上的，在「五四」之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儒家且只是一種歷史名詞，就此而言，談「儒家社會主義」或者說儒家與社會主義的融合是需要特別論證或值得討論的。

再次，甘先生說「『和諧社會』這個概念毫無疑問是植根於中國儒家傳統的，這與以往強調的西方傳統的『階級鬥爭』概念有根本的不同」，這一說法既存在有問題的地方，又存在需要論證的地方。有問題的是，他把中國儒家傳統歸結為「追求和諧」和把西方傳統歸結為追求「階級鬥爭」是否過於簡單？眾所周知，「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概念，它如何成為西方所強調的傳統呢？實際上，與甘先生的說法相反，任何時代的統治階級大都不是宣揚階級鬥爭，而是宣揚階級調和，他們也在追求「和諧」。另外，需要論證的是，「和諧社會」的提法怎麼就是源於中國儒家傳統？或者說，把「和諧社會」還原到儒家傳統是否合適？這是需要甘先生做出特別論證的。

當然，需要論證或值得討論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們就不再一一提示了，如果甘先生要使自己關於「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言之成理，言之有據，他至少要回答我們以上提出的問題，不

然，他的所謂「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的合法性就是有問題的。

## 二 「儒家社會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

看到甘先生「儒家社會主義」提法，人們馬上會想到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法。進而會問，「儒家社會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間是一種甚麼關係？提「儒家社會主義」是否意味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有問題，是否意味著它不能概述中國當前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抑或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法本身沒有問題，但其外延過大，無法具體體現中國當前的「新改革共識」，所以應該用更具有現實概括力的「儒家社會主義」取代它？又抑或是，「儒家社會主義」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者是後者的明確化和目標？這就是涉及到「儒家社會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這是「儒家社會主義」提出者所無法回避的問題。

讓我們來一一分析這些關係的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已經過時，需要用新的提法取代它，「儒家社會主義」恰好能擔此使命，甘陽先生提出的「儒家社會主義」是否隱含此意？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不妨作為一種可能性加以探討。

我們看到，在甘文中，作者提出了「新改革共識」，那麼，與其相對應，是否還存在一個所謂的「舊改革共識」呢？如果說「新改革共識」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甘先生所提出的「儒家社會主義」，那麼「舊改革共識」是甚麼呢？是不是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那是否意味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共識已經「舊」了？如果真的「舊」了，它「舊」在哪裏？這是需要說明或論證的。如果這種可能性成立的話，那麼，「儒家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代表著不同階段的理論成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代表「舊改革共識」，「儒家社會主義」代表「新改革共識」，由於前一種形式無法容納新的內容，所以要用後者取代它。

第二種可能性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法本身沒有問題，但其外延過大，無法具體體現中國當前的「新改革共識」，所以應該用更具有現實概括力的「儒家社會主義」取代它。從甘先生的文章上看，這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勿庸置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法的確外延很大，幾乎是個大口袋，一切帶有中國色彩的東西都可以往這個口袋裏裝，如果從減少概念外延過大帶來概念混亂的角度來看的話，對「有中國特色」加以限制，使其更清楚，也未嘗不可。但是，這種限制是否就應該是「儒家」？或者說，把「有中國特色」限為儒家是否合適？我們知道，「有中國特色」外延很大，其包含的內容也很廣，從政治、經濟到文化、語言、民族、歷史，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而「儒家」的外延明顯小很多，在現代，它的內容主要是思想文化上的。我們姑且不管儒家思想文化上的許多爭議，就是用這麼一個只限於思想文化的「儒家」概述當前涉及方方面面的新改革大潮是否合適？「儒家社會主義」是否比「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具有現實概括力？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種可能性是「儒家社會主義」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者是後者的明確化和目標。在甘文中，這層意思似乎最明顯，從其「中國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形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說法中，我們似乎能看到這層意思。

如果是這種可能性的話，那麼，「儒家社會主義」就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價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指「儒家社會主義」，或者說，「儒家社會主義」乃是「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要達到的目標。且不管這是否鄧小平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衷，我們先來看看這種說法本身是否合適，或者說，這種說法有哪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按照通常的理解，鄧小平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貫徹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普遍性是指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特殊性是指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中國這個特殊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中如何建設具有普遍價值目標的社會主義問題。如果這種理解沒錯的話，那麼，「有中國特殊的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乃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只是特定環境歷史中需要顧及到的，而非最終目標，甚至是最終要被最終目標所超越的。與此不同，甘陽先生認為「中國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所講的「儒家」就與鄧所講的「有中國特色」就不能等價了，因為「儒家」不是要被超越的，而是要被實現的，是一種目標性的價值，作為中國傳統的「儒家」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環境傳統，而是價值支撐，很顯然，這種說法有用「儒家」價值目標取代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嫌疑。如果是這樣的話，「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就顛倒了過來，不是「儒家」服務於「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服務於「儒家」了。設若如此，與其稱「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到不如稱「社會主義儒家共和國」，後者比前者更明確、更直接。

當然，「儒家社會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是個大的理論問題，對其進行縱深論述是需要許多筆墨的，在此，我們只是提出它們之間的關係的幾種可能性，以供參考和討論。

### 三 「儒家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的關係問題

我們看到，「新共識」與「舊傳統」的關係問題是甘文最為關心的問題，或者說，如何解決「新共識」與「舊傳統」之間的矛盾，是甘文的立足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社會主義」的提出，乃是甘先生解決這一難題的理論嘗試。但是，就目前的中國現狀來看，「新共識」與「舊傳統」都是很模糊的概念，對它們的界定還存在著這樣和那樣的爭議，沒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如何較好地給出「新共識」與「舊傳統」的定位，依然是個問題。作為一種嘗試，甘先生提出的「儒家社會主義」能否很好的統一「新共識」與「舊傳統」，妥善處理時代精神與歷史傳統的關係呢？這還是個需要考察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關於傳統與現代關係的認知逐漸發生了變化，開始從對傳統的激進反叛轉變為對傳統進行消化吸收，在對傳統的處理上，人們表現出更理智和更清醒的態度，這顯然是一種進步。但是，由於「五四」之後，特別是中共建國後，遭到激進批評和破壞的傳統已經支離破碎，如何重整傳統，整合出一個甚麼樣的傳統，這是一個已經開始討論並且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傳統也有自己不可改變的內核，因此，傳統總是一個被解釋的傳統和不能被完全解釋的傳統的結合，或者說，傳統就是在被解釋與不能完全被解釋之間顯現出來的一種歷史與現代的張力，這種張力要求我們傳統地面對現代和現代地面的傳統。傳統地面對現代意味著傳統並沒有完全死去，傳統中潛藏著不可超越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貫穿於任何時代，一旦遭到破壞，歷史的統一性就會出現問題，歷史就會出現反彈，需要重新思考與回歸，當前西方保守主義的興起和中國國學的走熱，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種歷史的反彈，因為以現代價值為標籤的某些歷史事件破壞了傳統中的不可超越的普遍性，比如西方奧斯維辛事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事件的極端殘酷性讓人們重新思考人性與人的尊嚴，

把人們從現代性的極端拋回到最為傳統的價值問題之上，潛藏在傳統中的普遍性以其難以思議的非強制性被凸現為不可超越的權威性。

但是，成為傳統中最不可超越的普遍性的並不是其最高的價值目標，而是其最低的價值底線。有鑒於傳統價值目標所形成的歷史條件，其所依托於想像力而建構出來的價值理想往往具有烏托邦的性質，作為激勵人們的信念，它是必要的，作為人們行動的指南，它卻是非常危險的。我們看到，從法國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任何想把以烏托邦價值轉變為現實價值的歷史行動都是災難性的，這些災難性的事件反過來把人類拋回到傳統的最低價值底線，這時傳統才作為傳統出現。由此看來，任何傳統所設立的價值目標都旨在超越傳統本身，都具有現代色彩，在此意義上，現代和傳統是極其相對的，從歷史的眼光看，總是傳統中有現代，現代中有傳統，傳統與現代的平衡是歷史的常態，傳統與現代間平衡的破壞是歷史的變態。

如果能這樣看待傳統與現代的歷史關係的話，那麼，我們看到，傳統提供給現代的最有價值的東西不是它的最高價值理想，而是它的最低價值底線。任何時代都有超越其自身的價值衝動，都不缺少其最高價值理想，對最高價值理想的擔憂總是沒有太大的必要的，相反，人們在追求最高價值目標時卻總是忘記了價值底線。就此而言，在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中，最為重要的往往不是用傳統的最高價值目標來指導當前的現實行動，反倒是應該用傳統的最低價值底線來限制現代的最高價值目標，以避免人類行為完全脫離傳統，導致破壞傳統中不可超越的普遍性而形成歷史災難。就此而言，甘陽先生用儒家的最高價值目標來詮釋當前歷史成就是有其不恰當的地方，其「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既有點似是而非，又有點似非而是，既像用儒家來指導社會主義，又像用社會主義來引導儒家，在最高價值與價值底線之間沒有可以辨別之處。

顯而易見，甘先生提「儒家社會主義」的本意是想融合「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形成基於傳統的「新共識」。但是，「儒家社會主義」是否是個合適的新瓶子，它能否裝進中國傳統這壺舊酒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則需先回答以下幾個主要問題：第一、何謂儒家？對於儒家來說，哪些是可以被解釋的，哪些是不能完全被解釋的？第二、儒家的核心價值是甚麼？

「和諧思想」是不是其核心思想，即使是，它如何與現代對接？第三、如果「和諧思想」是儒家的核心價值，那麼它是現代和諧思想的價值資源還是指導方向，如果是前者，「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是否是喧賓奪主？如果是後者，它是否和當前的意識形態相抵觸？第四、儒家是否有其負面價值，「儒家社會主義」如何處理其負面價值？第五、「儒家社會主義」是不是「儒家」的新意識形態化，如果是，那麼這種新意識形態化的儒家在當前中國意識形態中處於甚麼樣的位置？如果不是，「儒家社會主義」的提法又當如何解釋？。

當然，這些問題都是大問題和深層次的問題，但又是不得不提出來的問題，它們關係到「新共識」與「舊傳統」關係的處理，只有很好的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說妥善的處理了「新共識」和「舊傳統」。顯然，甘先生的「儒家社會主義」能否妥善處理「新共識」與「舊傳統」的關係，主要看他怎麼回答這些問題，能否合乎邏輯的回答這些問題了。

王 俊 東南大學哲學與科學系講師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七期（2007年10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